

决策

徐占权 徐婧

长征中重要会议 的解读

存亡



解放军出版社

决策

徐占权 徐婧

长征中重要会议 的解读

存亡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 / 徐占权, 徐婧编著.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65-7295-8

I. ①决… II. ①徐…②徐…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会议资料 IV. ①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3049号

书 名: 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

编 者: 徐占权 徐 婧

责任编辑: 吴立新

封面设计: 龙丹彤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E-mail: jfjcs@126.com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56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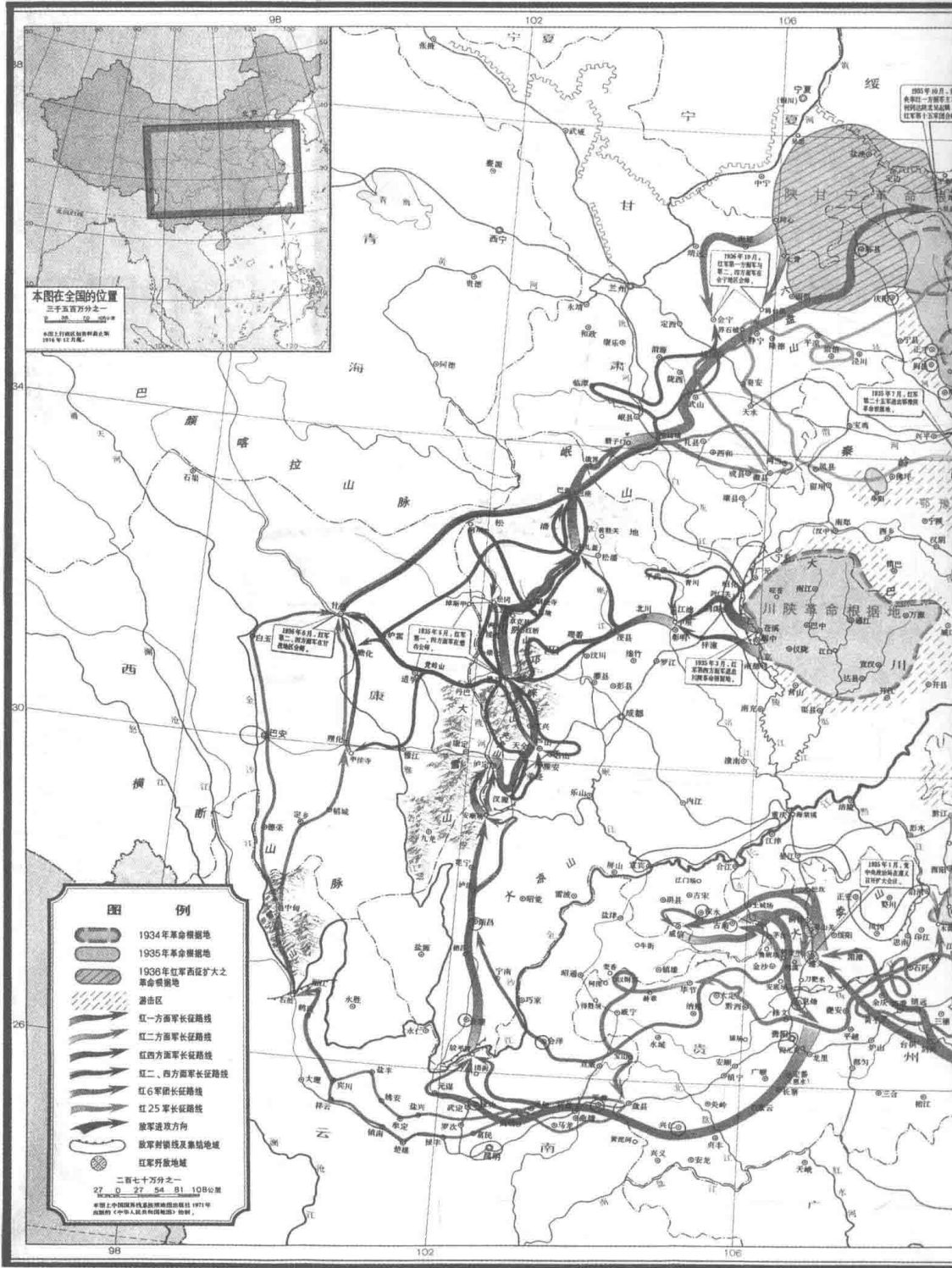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65-7295-8

定 价: 8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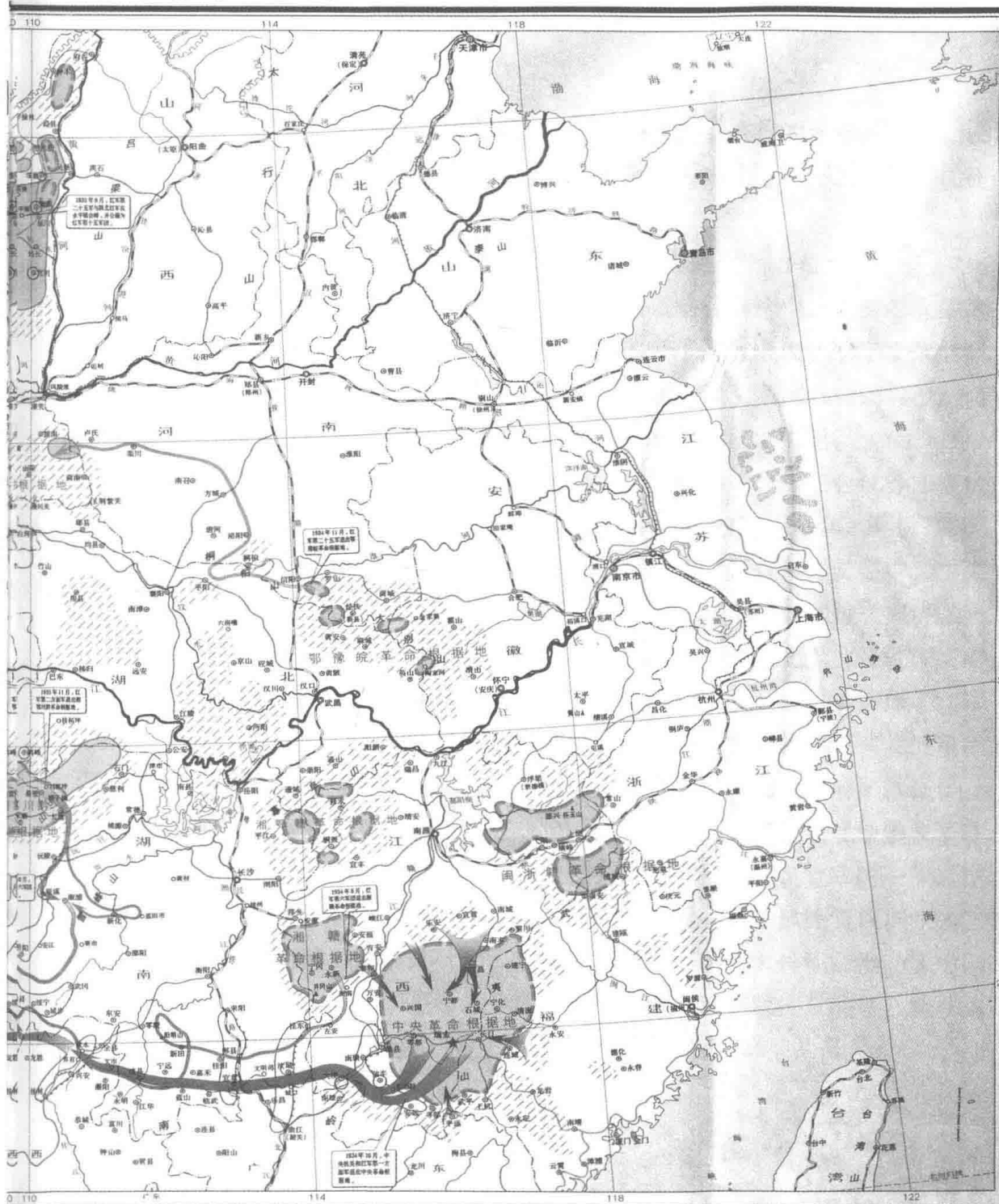
中国工农红

1934年8月



红军长征路线图

—1936年10月



开 篇 语

红军长征是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长征中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适时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不但决定了长征的方向，也决定了红军的生死存亡。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在紧急的战略转移途中，在血与火的战斗间隙，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土城会议、扎西会议、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甘泉会议、瓦窑堡会议、延长会议、晋西会议、大相寺会议、保安会议等70多次重要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了战略转兵、解除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决策权与指挥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党内最为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制定了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妥善地处理了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选择了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政策和以“发展求巩固”为核心内容的战略方针，纠正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坚定了红军广大指战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理想信念，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军民生死相依、团结奋战的革命积极性，突破了优势国民党军的一次次围追堵截，使红军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挫折走向胜利，最终实现了党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结束了历时两年的伟大长征，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开创了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为之后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 1

- 3— 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
- 4—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号召抗日救国
- 6—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中共中央统治地位
- 10— 毛泽东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做坚决斗争
- 12— 毛泽东遭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 14— 赣南会议，开始排挤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
- 16— 赣州战役，在毛泽东坚决反对下发起，并以失败告终
- 18— 江口圩会议，毛泽东向闽浙赣发展的主张遭到否决
- 20— 瑞金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接连攻占龙岩、漳州
- 22— 缴获不多，消耗较大的南雄、水口战役
- 23— 在周恩来坚持下，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 24— 宁都会议，毛泽东再次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 28— 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投身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成绩显著
- 31— 中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到瑞金，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 35— 国民党蒋介石开始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 40—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二、黎平会议，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兵 / 57

- 59— 通道会议，周恩来对红军行动路线作了调整
- 76— 黎平会议，完全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 81

- 83— 猴场会议，解除了李德的决策权和指挥权

- 87— 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
- 92— 扎西会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 99—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四、土城会议、四渡赤水，实现了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 105

- 107— “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 110— 土城会议，一渡赤水河
- 113— 二渡赤水河，遵义大捷
- 118— 调敌西进，三渡赤水河
- 120—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
- 121— 威逼贵阳，调敌东进
- 122— 进军云南，逼近昆明
- 123— 鲁口会议，巧渡金沙江

五、会理会议，平息遵义会议后的余波 / 127

六、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 / 139

七、沙窝、毛儿盖、俄界会议，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 / 157

- 159— 索观瀛官寨会议，第一次专门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 161— 张国焘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企图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 172— 沙窝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坚持继续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
- 187— 毛儿盖会议，决定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
- 195— 张国焘迟迟不动，找借口不执行毛儿盖会议决议
- 198— 张国焘将他与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南下之争公开，并企图以“武力”解决
- 217— 俄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继续北上

八、哈达铺、榜罗镇会议，决定落脚陕北 / 223

- 225— 哈达铺会议，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合
- 230— 榜罗镇会议，决定“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233— 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

九、吴起、甘泉会议，把党的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 239

241— 吴起镇会议，决定保卫陕甘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

248— 纠正陕甘晋省委的错误“肃反”，迅速稳定陕甘局势

250— 甘泉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重建红一方面军

253— 直罗镇战役胜利，为党的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257— 为巩固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十、瓦窑堡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问题 / 265

267— 根据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形势，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不断调整党的方针、政策

274— 瓦窑堡会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和战略方针的确立

283— 为适应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党中央连续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首先开辟华北

十一、延长、晋西、大相寺会议，积极践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政策 / 295

297— 延长会议，决定东征，进一步统一党和红军的战略思想

301— 晋西会议，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思想在全党全军得到统一

313— 大相寺会议，总结东征经验，决定西征

317— 红一方面军举行西征战役

320— 西征战役的重大战略意义

324—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多次召开会议，做出加强部队建设等决定

十二、保安会议，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的战略计划 / 331

333— 党和红军领导人不断同张国焘联系，促其觉悟，率部北上，共谋抗日救国大业

358— 保安会议，部署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一、

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效法西方，“脱亚入欧”，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在促进近代化发展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侵略中国、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

从明治维新开始之后的70余年间，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穷兵黩武，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华战争。1874年，日本首先侵犯中国领土台湾，随后又强行把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并入日本版图，从而为推行“大陆政策”迈出了重要一步，完成了对华侵略的战略试探。接着，日本先后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日本从发动侵略中国台湾岛的战争开始，几乎每隔5~10年，就进行一次对外侵略战争，特别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窥测，于1894年借口朝鲜事端，发动了大规模侵华的甲午战争（史称第一次中日战争），这是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重大步骤。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占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攫取了巨额战争赔款和一系列在华的权益，使日本的国力得到极大扩充。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跻身其中。1900年，日本作为主力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通过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京、津等地的驻兵权。1904年，日本为同俄国争霸东亚，在中国东北发动了历时19个月的日俄战争，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随即建立了殖民统治机构和侵华武装关东军。

日本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十分强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无暇东顾之际，为了独霸中国，借口对德宣战，

强夺胶济全线，攻占青岛，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日本还利用世界列强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积极扶植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扩张其在东北的势力。1915年日本公然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

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通过“田中奏折”，制定了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构想。为加快实现“大陆政策”的既定目标，日本帝国主义趁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内战之际，于1931年，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悍然对中国发动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于1932年入侵中国上海等沿海地区，1933年入侵中国关内，1935年又蓄意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把中国的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号召抗日救国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对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一再妥协、退让，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继续调集重兵、连续不断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以维护其反动统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代表全国人民提出抗日救国的要求，站在抗日救国运动的最前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把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抗日救国的前沿阵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机，不顾自身安危，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公开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22日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从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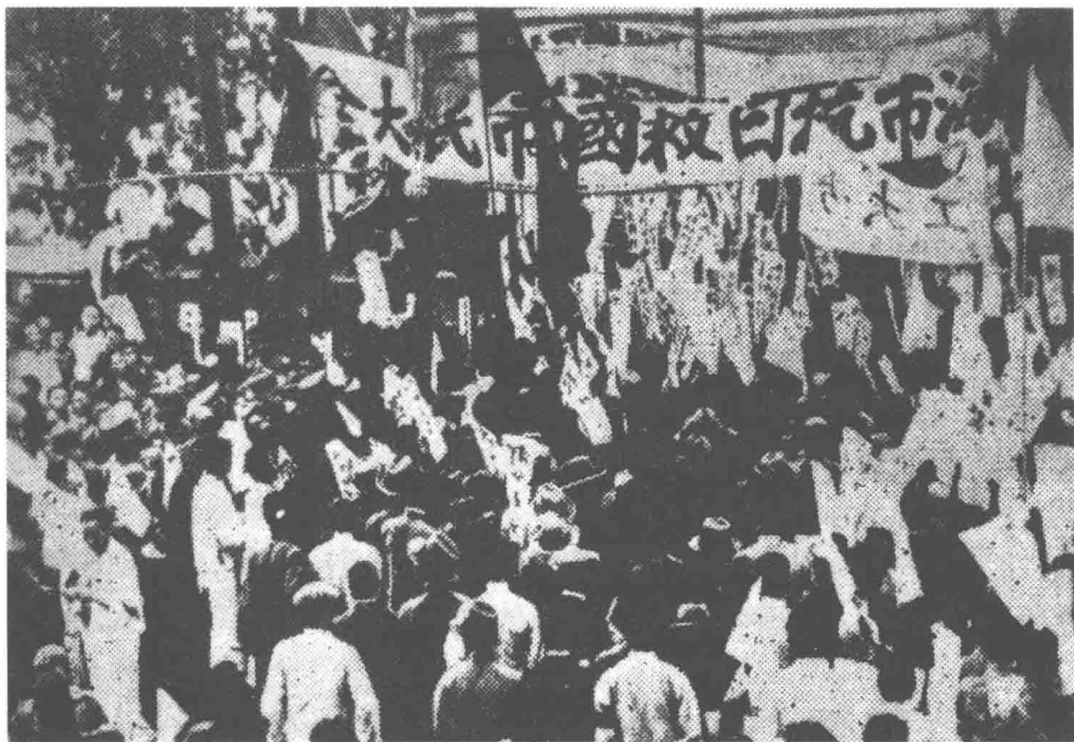


图1-1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发展。图为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举行抗日救国大会。

情的革命斗争上来”；东北地区的党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迅速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全国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内战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1930~1931年红一方面军等部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实现了由以游击战争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并被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多数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也迅速发展到15万人；人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相继建立，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和中国工农红军有了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指挥机关；国民党第26路军将士不愿继续在江西围剿红军，准备北上抗日，被蒋介石下令重兵围堵。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改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第5军团。红军兵力由4万余人，猛增至6万余人，红军不但增加了一支生力军，而且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卖国内战政策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从1932年起，先后组建了10余支抗日游击队，在南满、东满、北满等地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军以极大的打击。这些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以及加强红军建设等十分有利。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中共中央统治地位

中国革命形势虽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虽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但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而且它得到了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它的军队数量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而红军与国民党军相比，数量少，武器装备差，物资供应困难；苏维埃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①；革命根据地是流动的、不巩固的，并处在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尚未连成一片，而且这种状况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基本特点。如果“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②。

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于1931年1月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他们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不了解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片面夸大了中国革命的有利条件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利因素，否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实际，并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地照搬外国的经验，片面强调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企图迅速夺取中心城市，尽快实现其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他们片面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190页。

^② 同上，第187页。

和当时中国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农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竭力强调反对富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对全民族抗日救国运动的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忽视了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继续强调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进攻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继续实行“关门主义”，主张打倒一切。尤其是“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原则视若无睹”。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先后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等问题给各苏区党和红军的训令》《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的信》《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等，明确地制定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等各个方面比较集中地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第一，片面强调“进攻路线”，要求红军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他们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实行不停顿的进攻，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在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在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他们反对实行“诱敌深入”，主张实行冒险进攻；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反对运动战，主张阵地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主张战略的速决战、战役战斗的持久战；反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主张与敌人拼消耗，以及实行

“先发制人”“全线出击”，等等。他们认为，红军是执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要力量，“目前红军一切的建设，应该适合于实现这一任务的要求”。他们轻视甚至否认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低估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决定作用，要求红军加强“堡垒战、街市战、射击飞机等等的演习”，不适当地强调红军尽快提高技术能力，企图实行阵地战、攻坚战，与敌军拼消耗，“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第二，片面强调政治委员的决定作用，取消党对红军实行集体领导的根本制度。他们说，现时红军中“亦以党包办一切，于是军事指挥与政治委员的权能便表现不出来”，“这在〔与〕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因此，他们要求“政治委员制彻底实行”，红军中的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尽快取消。并规定：“政治工作要独立起来和有系统地进行，军队中党的生活应是为巩固红军和保证一切命令的执行，而不是包办一切”，等等。同时，他们放弃了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第三，片面强调红军的“正规化”，要求实行绝对集中主义。他们反对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武装力量体制，片面强调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作用，“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他们认为：“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与形势和任务是不相称的。因此，要求红军“不仅要集中那些已经脱离生产的独立团和赤色警卫队”，“还应到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游击队中去做扩大红军的运动，吸收他们最勇敢的分子到红军中来”，实行绝对集中主义，“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要“动员城市的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改善红军的社会成分”，“使之成为真正政治上坚定、有强固战斗力、而能担负大规模作战的‘铁的’红军”；要“组织特种兵的部队，炮兵、骑兵，甚至飞机队”，加紧现代战术与特种兵器使用的训练；要“尊重国际改造红军的主张”，按照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所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和编制方案，对红军进行“重新改编”，“开始适应于大规模的作战组织”，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第四，片面强调“大后方主义”，要求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他们否认人民军队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思想、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